

南亚与中国地缘安全关系探析

杨焰焯

(公安边防部队士官学校,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 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国家安全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从空间位置上看, 南亚与中国的毗邻关系, 成为制约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从地缘实力上看, 随着南亚地区国家实力的变化, 中国与南亚的安全关系不断变动; 三、由于南亚地区“众星围月”的地缘政治结构, 排斥包括中国等任何进入印度势力范围的外部力量; 四、中国与南亚地区积极的地缘互动关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南亚国家安全关系的改善。

关键词: 南亚地区; 地缘安全; 国家安全; 共同边界; 中印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8) 01-0079-08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8.01.013

On the Geopolitics Secu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 Asia and China

YANG Yanchan

(Public Security Border Defense Force Academ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geopolitical secu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 Asia and China. Mainly in four aspects: First, from the spatial point of view, the adjacent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Asia and China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restricts their relations.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al strength,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strength of the countries in South Asia, the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Third, the geo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stars around the moon” in South Asia is a unipolar structure that excludes any externalities such as China that enters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India. Fourthly, the active geo-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Key words: South Asia; geo-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common border; Sino-Indian relationship

南亚地区与中国山水相连, 在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关系密切, 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重点地区。采取宏观视角以及从权力与空间关系角度探讨南亚与中国地缘安全关系, 对中国国家安全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南亚与中国的空间位置关系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拿破仑说过: “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就了解

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1]同理, 中国与南亚之间地缘政治环境的基本状况, 包括中国与南亚地区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以及实力对比情况, 决定了中国国家西南方向安全的基本面。

南亚位于中国西南方向与中国西南部接壤, 与中国是毗邻关系。南亚地区的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四国顺时针依次与中国接壤, 共享大于 4500 km 边界线。(四国基本情况见表 1) 孟加拉虽然不与中国接壤, 但是与中国相邻, 距离较为接近, 且双边关系较为密切, 也是中国的

收稿日期: 2017-08-26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 2015 年度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

作者简介: 杨焰焯 (1973—), 女, 云南文山人, 高级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南亚、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

近邻。莱维斯·理查森（Lewis F. Richardson）认为：政治实体相邻，为冲突创造了机会，享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之间比不相邻的国家之间更容易爆发冲突，且国家的边界长度与该国的交战范围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2]中国与南亚由于地

缘相邻，双方冲突的机会也由此增多。20 世纪，南亚最大、与中国共享边界最多的国家印度就与中国发生过一场边界战争，且至今没有解决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争议，成为制约中印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 1 南亚与中国毗邻国家的基本情况^{*}

国家	面积/km ²	人口/亿	与中国 边界线/km	GDP/亿 美元	GDP 增速/%	双边贸易额/ 亿美元	军队人数/ 万人
印度	298.0	13.11	2000	21825.77	7.3	716.2	127.0
巴基斯坦	79.6	1.89	600	2709.61	4.2	154.1	56.9
尼泊尔	14.7	0.28	1400	213.56	3.4	8.7	6.8
不丹	3.8	0.00775	550	22.09	7.7	0.1	1.6
孟加拉	14.8	1.61		2023.33	6.4	147.0	15.5

※资料来源：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5》；经济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年 10 月）和中国外交部发布；政治和军事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发布；与中国边界线数据来自叶自成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3]。

然而，中国与南亚相邻的这一段地缘线却是中国周边地缘线中较为稳定的一段。历史上，中国与这一地缘线周边的国家很少发生冲突。1960 年毛泽东同尼泊尔首相毕·普·柯伊拉腊（Koirala）谈话中形象地说明了原因：“山很高，山可以保证我们边境的安全。”^{[4]394}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也指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积上举世无双，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大’。它将进入中国和印度的通道远远隔开，这两个国家的西北边界也因此具有了特殊意义。”^{[5]73}中国西南地缘线与中国周边其他部位相比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以及喀喇昆仑山脉形成了巨大的地理屏障，一条高原地缘线将中国与南亚国家分隔在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中。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高山脉，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它隔开了山脉南北两侧政治力量中心之间的互动，使其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贸文化的交流都非常少。在这两个山脉区域里，冰峰林立、绵延不绝，高山地带平均海拔达 5500 m 以上，通行极为困难，人烟极为稀少，且缺乏重要的战略资源。在这样恶劣的地理条件下，高山两边的地缘政治实体进行地缘政治互动的机会很少，互动的成本也很高，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获得的收益将远远抵不上付出的巨大代价。所以，

历史上，中国的西南地缘线相比较而言一直是较为稳定和安全的。

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巨大的地理屏障对地缘政治形成的限制已经部分被突破。特别是以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第五次“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改变了中国与南亚之间的时空关系，大大缩短了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为中国与南亚之间打开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目前，中国与其南亚的最大邻国印度在控制空间的能力方面均大为增强，都拥有足以相互威慑的核武器，双方的导弹都可以覆盖对方全境。对于拥有高端军事装备的国家而言，时空距离已经是截然不同的概念，非接触式战斗将成为主要作战样式。在现代战争中，双方的兵力不再短兵相接，部队均位于敌人常规武器射程之外，利用 C4I 系统（即指挥、控制、预警探测、通信和情报系统）综合协调各部分火力集中攻击主要目标。因此，从军事角度看，技术进步使中国面临来自南亚的安全威胁增加了。

当然，新的军事技术的出现和运用，并不意味着新的地缘政治形态完全取代了旧有的地缘政治形态、中国与南亚之间巨大的地理屏障完全被克服并失去作用。事实上，“世界屋脊”依然是中国与南亚之间最有效的“安全屏障”。由于中国与南亚 7

个国家掌握的新兴军事技术水平以及控制空间的能力不平衡，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依然是双方必须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对南亚地区诸小国而言，地缘政治竞争依然发生在旧的地缘政治空间里。目前，中国与南亚之间正处于一种新旧地缘政治形态并存、新旧地缘政治空间立体交错的结构中，地缘政治关系较为复杂。

二、南亚地缘政治实力变化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领土面积、地理位置、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等根本影响一个国家潜在的實力。历史上发生的战争，绝大部分是为了争夺对领土和人口的控制权。詹姆斯·多尔蒂（James Daugherty）等在《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指出：“地缘政治学关注的焦点是国家权力和领土控制，那些具有较远距离投放能力的政治实体将在工业时代占据支配地位。”^{[6]166} 地缘政治学家认为，拥有较大实力的国家会在其周围形成一个势力场，势力从中心向外流动或扩散，越过国家的政治边界，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在势力向外流动的过程中，要克服距离的摩擦损耗，遵循“力量梯度磨损”（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规律，即“势力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度越是减小”^{[7]12}，克服距离损耗的费用就越高。

南亚地缘政治实力是一个不断消长、动态变化的过程。古印度时期，南亚地区政治上四分五裂，即使是在少数几个大一统的帝国时期，中央王朝的政治力量也很难覆盖到喜马拉雅山脉高山地带地理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古代中国虽然维持了长期的大一统，但是由于“实力的投射强度确实随距离的增大而减弱”^{[7]102}，对中国与南亚交界地带也仅是维持了较为松散的管理，双方之间形成了一条传统的习惯线。整个古印度时期，南亚的政治力量从未覆盖到中国与南亚地区交界地带，所以双方从未发生过碰撞，保持了长期和平友好的历史。

英殖民统治时期，次大陆第一次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地缘政治板块，“英印帝国”力量空前强大，其向北流动的力量在中国与南亚地区交界地带与中国的力量发生了碰撞。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奥沙利文

认为：两个处于竞争状态的核心区，在双方“各自势力的到达处，将会把位于他们之间地域上的机遇的排列一分为二”，根据双方施展的实力多少，在一定区域就会形成“彼此开展实力竞赛”的势力重叠区域。假若两个实力核心区，“在他们有效的势力重叠之前，并未形成这样一个有效下限（中立带）……在重叠的范围上可能发生冲突”^{[7]74-78}。“英印帝国”与中国、俄国冲突博弈的结果是力量强大的英国强行在自己的地图上划出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虽然正值积弱积贫时期，但坚决反对和从未承认这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印度独立后，成为了“英印帝国”力量的主要继承者和南亚势力场的力量核心，奉行向外扩张的政策，在其向北“蚕食”中国领土的过程中，与中国力量发生了对撞，爆发了1962年中印战争。正是由于国家实力的增长使得印度和中国均有能力将国家力量覆盖至双方的边界地区。印度中国问题专家苏吉特·杜塔（Sujit Dutta）指出：“中国和印度跨越了南亚、西南亚和东南亚共同的地缘政治空间喜马拉雅山，这就造成了战略和地缘政治的竞争。”^[8] 中印战争后，中国军事力量主动退出争议区，双方军事力量脱离了接触，在两大政治力量之间形成了一条实际控制线。

南亚方向，除印度外的其他国家与中国相比实力较弱，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影响力较为有限，对中国构成的安全威胁也相对较小。正如1960年毛泽东对尼泊尔王国首相毕·普·柯伊拉腊所言：“我们是大国，从来不怀疑你们会侵略我们。”^{[4]390} 由于中国奉行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加之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地理屏障，因此他们也没有感受到来自北方中国的安全威胁。相反，他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政治中心距离他们更近的印度。在实力严重不均衡的地缘政治结构中，距离更近的强权对小国构成的安全威胁更为现实和迫切。为了抵御来自印度的安全威胁，他们往往利用与距离较远的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来平衡印度的影响，这就是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地理上的距离可以产生政治上的吸引力”^[9]。印度是南亚地区最为强大的力量，是南亚势力场的核心政治力量，在南亚地区的政治生活中拥有支配性的权力，

也是关系中国西南地缘线安全、稳定的关键因素。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就没有将印度看做是威胁,相反将之看做是中国的朋友。毛泽东指出:“总的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4]376};“我们同印度吵了一年架,但还是朋友,朋友吵架是常有的,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都吵架”^{[4]392}。然而,庞大的中国还是令印度感到不安。印度建国之初,就强迫尼泊尔、不丹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迫使锡金沦为印度的保护国,其目的除了进行地区的地缘政治扩张外,也包含将尼泊尔、不丹、锡金三个喜马拉雅山南麓国家作为中印之间“缓冲国”的地缘政治考虑。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公开宣称中国是印度的安全威胁,1998年印度更是以受到中国的安全威胁作为其发展核武器的借口。印度对中国的不友好,也使得印度因素成为影响中国西南地缘线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

三、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国家构成结构,结构造就国家。”^[10]南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及其与中国之间的地缘结构关系深刻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

从南亚地区层面看,由于印度追求地区霸主地位,权力在南亚地区分配的结果是形成了以印度为核心的“众星围月”地缘政治格局。在这样的一个单极格局中,力量中心不仅是唯一的,也是排他的。任何企图进入力量中心势力范围之内的外部力量都会与力量中心发生结构性的冲突,并受到排斥。印度将南亚地区和印度洋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宣称“次大陆是印度的次大陆”“印度洋是印度的内湖”。任何进入南亚和印度洋的外部力量对印度的地区霸主地位都是一种威胁,对此印度均心存芥蒂。“五十年前,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直率地高度赞扬了由门罗和亚当斯提出来的这些规则”^[11],声称:“门罗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确保了美洲免受外来侵略近百年之久,现在到了将同样的门罗主义运用于亚洲国家的时候了”^[12]。排他性是印度版门罗主义的主要特点,其本质就是视印度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主人,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能插手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事务,控制次大陆、

称霸印度洋则是其目标。

毫无疑问,印度是南亚地区的霸权国,也具有形成霸权秩序所需要的力量资源。但是南亚地缘政治系统只是国际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子系统必然要与外界发生互动,也必然会有更强大的国际体系中的力量进入这个子系统。实际上,整个冷战时期,印度对美、苏、中等外部力量都心存芥蒂,强烈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克什米尔问题,十分在意美巴关系、中巴关系,也不满意美国在印度洋核心迪戈加西亚的军事基地,提出“印度洋和平区”的建议,主张限制美苏等国海军进入印度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所有进入印度势力范围的大国力量中,印度最排斥的是中国,似乎中国对印度的地区霸权地位威胁最大。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对印度来说从力量对比上来讲,美国对于印度过于强大,附和强权的收益远远大于对抗强权,相比而言对印度来说中国的力量远次于美国,与印度尚在伯仲之间,属于可以比较和对抗的级别。

就中印经济实力来看,1990年中国与印度的GDP规模差距不大,印度的人均GDP甚至还高于中国。(详见图1和图2)^[13]印度学者莫汉·古鲁斯瓦米和左瓦拉·多利特·辛格的研究也显示印度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GDP增长率还略低于印度,人均GDP也落在印度后边。^{[14]27}进入21世纪后,中印差距迅速拉大,“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并在国际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商品生产国……2007年,中国就已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进口国,同时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14]3}。中国国力越是强大,中国在南亚地区和印度洋上的影响力也越大,印度感受到的威胁亦越大,越是焦躁不安。“中国作为南亚地区第二重要的因素,它与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与美国的关系”^{[15]256},都引起印度的担心。印度国内学者和媒体大肆炒作中国与印度的邻居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的关系,如中国为了维护本国商品和能源在印度洋航线的安全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在一些港口进行的商业合作,就被印度战略界歪曲为是中国在构建“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 “企图建立一个围困印度的战略包围”^[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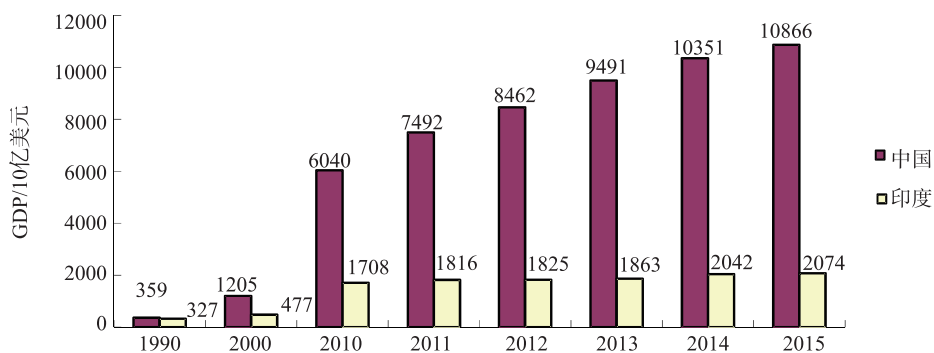


图1 1990年—2015年中印GDP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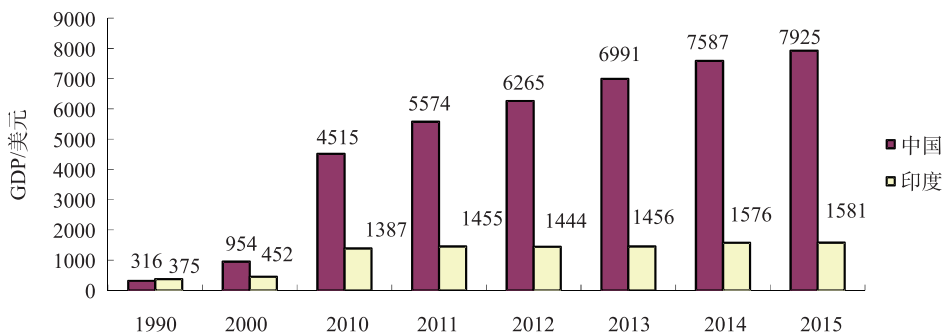


图2 1990年—2015年中印人均GDP比较

此外, 地缘政治的“距离磨损”(Distance Friction) 规律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更容易从相邻的大国, 而不是遥远的强国那里感受到威胁。美国远离印度, 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 而中国则是印度周边接壤国家中最为强大的国家。奥沙利文说过: “从军事上来讲, 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7]11} 美国虽然实力最为强大, 但是南亚远离本土, 美国强大的力量到达南亚地区除要“克服距离损耗的摩擦效应(The Friction Effect)之外, 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力耗费以及对远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Familiarity), 可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7]12}。所以, 距离是判断一国所受威胁的重要依据, 地缘的远近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距离近的国家相对于距离远的国家来说, 对本国的影响会大得多。所以, 印度最为担心的并不是距离遥远但最为强大的美国, 而是离他更近且力量远逊于美国的中国, 而中印历史上发生的边界冲突则进一步加重了其对中国的担忧。

同时, 从亚洲中观层次和国际体系宏观层次来

看, 在对亚洲大国和世界大国地位的追求上印度与中国战略目标一致, 存在结构性的竞争矛盾。目前, 中国与印度同为亚洲大国, 被誉为亚洲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很多结构现实主义观察家都将这两个在国际体系中共同崛起的“引擎”视为竞争对手。“在西方人的印象中, 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已有一个多世纪”^{[15]25}, 中国与印度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据经济历史学家安吉斯·麦迪逊的研究显示, “从公元元年起一直到19世纪早期, 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一半左右。在此期间, 中国和印度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着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 并引领着科技的潮流”^{[14]6}。但是, 进入近代以来这两个国家几乎一起衰落, 都经历了共同的被强权侵略和殖民的命运, 同时又在同一时期都获得了民族的独立、同一时期均开始改革开放, 并一起“放开刹车踏板”大步流星追赶发达国家。然而, 中国和印度共同作为亚洲和世界最大的两个新兴经济体、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人口国家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虽然两国崛起的平台(基

础)相似,发展的目标相近,但在结构性的竞争中其冲突却日益增多。

图1和图2中的数据显示,中国GDP增速始终高于印度,中国与印度GDP总量差距日益拉大。在中印竞争中印度明显处于下风,这对印度的大国梦是一种打击,制约了印度的亚洲和世界大国地位的追求,造成了印度对中国的猜忌和失落心理。“今天的和十五年前的中国与印度比较起来,中国的经济繁荣令印度吃惊。印度人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落后于中国,中国似乎正在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这既激起了印度人的好奇心,也令他们十分惊恐。”^{[15]258}在亚洲和世界层次上,许多印度人将北京视为“衡量印度‘崛起’成为一把世界性大国的标尺”^{[15]266},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与中国进行竞争和比较。一些西方国家将这一现象称为“龙象竞争”或“龟兔赛跑”,并在学术界掀起了“中印比较”的一股研究热潮。事实上,中印共同崛起,对国际体系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美国冲击更大。然而,由于中国的实力更胜一筹,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担忧更甚。这种担忧被称为美国的“中国恐怖症”。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抛出“中国威胁论”,煽动中国周边的国家参与共同遏制中国的崛起,力图将中国的精力消耗在与周边国家的周旋和竞争中,从而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印度凭借其不可小觑的实力和与中国存边界纠纷的历史,成为美国联手遏制中国的最好棋子之一。与此同时,印度也乐于利用中美结构性冲突,跟在美国之后,联手美国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共同遏制中国,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这对中国是一个不小的威胁。所以,即使历史上中印之间没有发生过边界冲突,或者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已经顺利解决,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印实力造成的结构性冲突仍会存在,并仍就有可能令印度感觉受到威胁,而引起系列连锁反应。

四、南亚与中国地缘互动关系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人类政治与地理环境是形成地缘政治的两大要素。它们互为因果、共同作用,不断构建出新的地缘政治形态。地理环境中蕴含权力,人类的政治行为必然要受到环境的影响。然而,“即使是在环

境的约束和限制之下,个人仍有选择能力”^{[6]167}。因为,地理环境相对稳定不变,而活跃于地理环境之上的人类政治则成为塑造地缘政治最灵动、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一旦地理环境确定,对国家安全环境、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人类政治,即:国家之间怎样看待对方力量的态度——是友好还是敌对;在各自的态度指引下双边关系怎样互动——是采取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安全战略;等等。

“地缘政治边际效应”理论认为:“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17]古代中国与古代南亚国家之间的交往虽不太频繁,但却维持了上千年的经济文化友好交往与互动。中国的僧侣、丝绸、茶叶、瓷器等沿着海陆“丝绸之路”不断去到南亚次大陆,古印度的佛教、音乐、天文历算等同样沿着海陆两条通道传播到中国。华裔学者谭中更是将佛教的传播看做是中印友好关系的“桥梁”^[18]。中国与古印度互相将对方看做是值得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伟大文明,双方之间的友好地缘政治互动关系,既推动了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也推动了两大文明的交融,更在两地人民心中留下了兄弟情谊的记忆。中国文学家鲁迅就曾经说过:“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赐,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使二国而危者,吾当抑郁,二国而陨,吾当为之号咷,无祸则上祷于天,俾与吾华土同其无极。”^[19]印度首位总理尼赫鲁也盛赞:“在上千年的中印两国交往互动中,双方都相互学习到了不少东西,不仅在思想上和哲学上,并且在艺术上和实用科学上……现在,命运之轮已经又转了一个轮回,中国和印度再一次满怀旧日的记忆,彼此张望;再一次,香客们正通过新的通道,越过或飞过两国分界的高山,带来令人欢欣鼓舞的信息和美好祝福,正在缔造新的持久友谊的纽带。”^[20]

在20世纪中叶,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相互视对方为第三世界的不结盟朋友,中国十分注意与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与南亚国家共同倡导了处理双边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潘查希拉 Pancasila)。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维持了一种亲密的互动关系,营造出了一种和平友好的外交环境,中国与印度之间更是度过了一段“印地秦尼巴伊巴伊”(Hindi Chini Phai Phai)的“蜜月”期。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印双方在涉藏问题、边界问题上的争执,最终扭转了双方关系良性互动的局面。此后,印度将在中印边界的战败视为耻辱,印度鹰派一直怀有强烈的“雪耻”心态,并在军备和核武器上与中国展开竞争,认为“只有当印度在核武器竞争上与中国持平,中国才会在边境争端上做出让步”。同时,印度将中国视为来自北方最大的安全威胁,将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交往互动视为“中国想包围印度。在印苏关系鼎盛时期,新德里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中国想破坏印苏关系。中国也被视为由美国、巴基斯坦组成的对印度战略包围圈中的一环”^{[15]257}。此后,正如美国学者约翰·盖佛(John W. Garver)所指出的,“地缘政治冲突一直支配着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21]。

20世纪70年代后,双方都开始努力修缮双边关系,但是进展不大。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关系改善和印苏关系疏远,中印双方的关系渐渐改善。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后,双方高层互访逐渐增多、互动频繁,推动中印关系趋于正常化。1993年双方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6年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与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防务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些均大大增强了双方的信任,缓和了双方在边境上的紧张局势,改善了双边的安全环境。此外,中印双方还建立了“年度防务对话”机制,使得中印两军互信建设逐渐机制化、常态化。同时,中印双方经济互动日益频繁,双边贸易额一路攀升。至2016年,中印双方贸易额高达696亿美元。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推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互信互谅,奠定了中印关系持久正常发展的坚实基础。

除印度以外,中国与南亚的第二大国巴基斯坦

也始终保持着一种密切的、朋友般的互动关系。这一友好关系不仅成为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以及中国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桥梁纽带,同时也为中巴边境营造了非常友好和谐的安全环境。此外,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亦一直保持友好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逐渐从战略安全利益关系转向经济伙伴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动更为频繁,关系更为密切。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当前中印两国领导精英在国际体系变革、加深经贸合作、共同崛起等诸多领域有着强烈的合作意愿,使得中印关系总体向好,但是由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依然对印度新一代领导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印之间还是出现了一些负面事件,两国关系甚至一度下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都加快了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速度,在共同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速度明显快于印度,中印两大力量之间的磕磕碰碰在世界范围内也在增多。面对在新旧地缘政治交织中更趋纷繁复杂的中印关系,中国的南亚安全战略应当反映南亚国家的地缘政治实力状况,顺应南亚地缘政治发展的趋势。尤其是随着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日益崛起,与中国国家安全的关联度还将进一步加大,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印度的关注力度,同时通过拓展中印之间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构建合作机制,消除安全疑虑,增进战略互信,在中印之间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营造有利于中印共同崛起的和平友好环境。

五、结语

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国家安全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空间位置上看,南亚与中国的毗邻关系,为“冲突创造了机会”,成为制约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从地缘实力上看,随着南亚地区国家实力的变化,中国与南亚的安全关系不断变动;三是南亚地区“众星围月”的地缘政治结构是一个单极结构,排斥包括中国等任何进入印度势力范围的外部力量;四是中国与南亚地区积极的地缘互动关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南亚国家安全关系的改善。

未来,南亚地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还将

提升,印度洋或许会逐渐成为世界海权新的“心脏地带”。由此,南亚、印度洋地区在中国国家安全中所占的地位也将提升,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更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 BRZEZINSKI Z.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M]. New York: Arrangement with Basic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1998: 37.
- [2] LEWIS F R. 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 [M].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0.
- [3] 叶自成. 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1998: 430.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文选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 [5] HALFORD J M.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M].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42.
- [6] 多尔蒂, 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M]. 阎学通, 陈寒溪, 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 [7] 奥沙利文. 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 [M]. 李亦鸣,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1.
- [8] SUJIT D. China's Emerging Power and Military Role: Implications for South Asia [M] // JONATHAN D P, RICHARD H Y. In China's Shadow: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8: 92.
- [9] 布热津斯基. 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 [M]. 刘晓明, 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22.
- [10] KENNETH B, STEVE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M].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64.
- [11] James R, HOLMES. Monroe Doctrines in Asia? [EB/OL]. [2017-06-15]. <http://the-diplomat.com/2011/06/15/monroe-doctrines-in-asia.htm>.
- [12] 论印度版的门罗主义 [EB/OL]. [2016-12-18].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htm>.
- [13] The World Bank [EB/OL]. [2017-06-15].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end=2015&locations=CN&start=1989.htm>.
- [14] 古鲁斯瓦米, 辛格. 追龙: 印度能否赶超中国 [M]. 王耀东, 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 [15] STEPHEN P C. India: Emerging Power [M].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 [16] SAMEER S. One Ocean, Two Shades: Perceptions about the Indian Ocean [EB/OL]. [2017-06-15]. <http://www.usnwc.edu/Lucent/OpenPdf.aspx?id=101&Title=Evolution.htm>.
- [17] 叶自成. 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16.
- [18] 谭中, 耿引曾. 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与激荡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323.
- [19] 鲁迅. 鲁迅全集: 第8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5.
- [20] JAWAHARLAL N. The Discovery of India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9-120.
- [21] JOHN W G.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0-111.

